

# 新世纪以来小说“乡村衰败”书写的症候式分析<sup>〔\*〕</sup>

雷 鸣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新世纪中国当代小说对乡村现实的表述,似乎遵奉共同的约定,即“乡村衰败”书写。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乡村的现实是复杂而多样的,有衰败亦有成长,但中国当代小说却通过乡村日常生活的全景凋敝式、乡村苦难的极端渲染式、城市蚕食的怨愤式、村庄消逝的直接悲悼式等四种叙事类型,单向度地书写“乡村衰败”。这背后的原因是创作主体与乡村之间的复杂联系以及社会现实因素(包括将乡村“问题化”的文学传统、作家童年经验与乡村现实之间的心理落差、乡愁体验的惶恐心态、城市困境的集体性焦虑等方面)的作用。聚焦在“乡村衰败”的文学书写,遮蔽了乡村现实的丰富维度,忽视了农民的要求,也造成了小说艺术上的同质化倾向。

〔关键词〕新世纪;当代小说;乡村衰败;文化症候;反思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11.012

##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作家各自视域与时代语境的差异,乡村在文学的表述中通常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或呈现萧索、荒凉之状,如鲁迅笔下的故乡;或类似优美、和谐的“桃花源”,如沈从文的湘西边城、废名的陶家村;或是一幅明朗、健康、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的美好图景,如柳青《创业史》中的蛤蟆滩、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清溪乡;或是新生乡村变革力量冲击传统观念的舞台,如贾平凹笔下的鸡窝洼。可以说,乡村在不同作家那里总是被建构书写,而成为千姿百态的文本化之“乡村”。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文学对乡村的表述没有了上述的“杂语喧哗”与“多元面孔”,很多作家似乎都在共同遵奉一个“约定”,即表述乡村,总是离不了对乡村衰败的书写。姑且不论那些流行于网络上的“春节返乡体”文章,比如王磊光的《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王君柏的《失落的乡村:一位大学教授乡村笔记》等。综观诸多职业作家虚构类的小说,地域不分东西南北,作家不论代际男女,乡村的衰败几乎成了 21 世纪文学表述乡村的“金科玉律”和“统一腔调”。兹略举几例:陕西作家贾平凹的《秦腔》(《收获》2005 年

作者简介:雷鸣,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长篇小说与文学市场互动关系研究”(批准号:15BZW169)阶段性成果。

第1、2期)、《极花》(《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宁夏作家季栋梁的《上庄记》,江苏作家赵本夫的《即将消失的村庄》,山西作家曹乃谦的《最后的村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湖北作家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四川作家罗伟章的《声音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辽宁作家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人民文学》2002年第1期),江苏作家叶炜的《富矿》(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后土》(青岛出版社,2013年)等。这些书写乡村衰败的作家,从代际年龄上,“50后”“60后”“70后”作家皆有;从地域上看,既有来自中西部地区的,亦有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这样的文学写作潮流,或许可以概括为“乡村衰败”书写。

对当下中国乡村现实的描述,真的只能是衰败景象吗?中国乡村真的彻底“沦陷”了吗?这里不妨从社会现实层面,简单回顾国家这些年来反哺乡村、促进乡村发展的举措:2000年,农村税费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农民种地还可获得各种补贴;2003年,政府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5年,国家启动新农村建设战略,输出大量财政资源,支持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的整治;2007年起,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2013年,国家又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倡议,大力提升乡村卫生环境;2015年,中央召开扶贫工作会议,要求2020年全部完成贫困人口的脱贫目标。

或许有人认为,如此多的战略、政策、措施,只是国家层面的理想蓝图,并没有真正在乡村落地生效。事实上,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无论以百年为尺度,还是以十年为尺度,中国乡村获得发展的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只看到问题而无视乡村的发展与进步,乡村恐怕早就解体了。”<sup>[1]</sup>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的发展与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比如乡村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乡村住房条件的提高,农村低保、医保的推行,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涌现。尤其在发达

大城市的周边,乡村更富有活力与生机,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来到村庄,体验乡村的田园生活。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的乡村因自然条件、历史原因、发展先后之差异,必然会面临不同的境遇,某些区域的乡村已然衰落亦是不争的事实。乡村人才流失、土地抛荒、村庄空心以及家庭空巢等现象的确存在,尤其是距离城市较远的偏僻乡村更加严重。所谓“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种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恰是对当下乡村衰败现象的生动概括。<sup>[2]</sup>

总体而言,中国当下乡村的现实情形是复杂、多样的,正如学者熊培云所说:“我看到乡村在沦陷,也看到乡村在成长。”<sup>[3]</sup>显然,乡村并非只有痛心疾首的困境与问题,中国乡村在发展转型亦不容否定。不过笔者却发现,21世纪中国当代小说对乡村现实的书写,似乎有意漠视乡村情形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一方面选择性地忽视成长的乡村,遮蔽乡村之生机与活力的维度;另一方面则渲染、放大乡村的衰败与凋敝。大多数作家笔下的乡村成了一片萧然的“悲惨世界”。为何迷恋以单向度的“衰败”来表述乡村呢?这是一种值得思考、探究的文学现象。由此,本文试图提出的是:小说创作为何会在乡村的“实然”与文学表述的“应然”之间产生裂缝?潮流式书写“乡村衰败”背后折射出创作主体的何种心态以及哪些社会文化症候?单向度的“乡村衰败”叙述给文学的乡村表述带来了哪些限度?

## 二、“乡村衰败”书写的几种类型

在20世纪中国,“乡村衰败”作为文学作品的题材并不鲜见,不同时期的作家书写这一主题时,寄寓着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前文提到的鲁迅的《故乡》,摹写破败的乡村黯淡画卷,旨在渲染乡村的落后与传统封建文化在乡村积淀之深,表达用现代观念启蒙、改造愚昧乡村的急切性。20年代中后期,王任叔、许钦文、鲁彦、彭家煌、蹇先艾等乡土小说作家,深受鲁迅创作之影响,同样表现乡村之惨淡、破败,与鲁迅的现代

性启蒙立场一脉相承。30年代初期,左翼文学崛起,“乡村衰败”的书写亦是蔚然成观,其目的是揭示乡村破败之根源乃是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从而宣示农民起来反抗的必然性,如华汉的《地泉》、叶紫的《丰收》《火》等即是典型的文本。后来的“十七年”文学亦有对“乡村衰败”的书写,要么揭示侵略战争给乡村带来的无比深重的灾难,如抗战题材小说《苦菜花》《平原枪声》等;要么通过叙述旧社会乡村的凋敝,在对比中论证新政权的必然性与合法性,增强对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的美好想象与认同,如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浩然的《艳阳天》等。

不过,上述“乡村衰败”书写的时代语境在21世纪的中国而言早已不复存在,那么当代作家表现这一主题的话语意涵、书写方式,自然也有别于鲁迅、鲁彦、彭家煌等现代作家以及“十七年”时期的作家。我们知道,今日中国乡村是处在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的步伐狂飙突进的场域中。“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sup>[4]</sup>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书写乡村衰败,其话语意涵、书写路径都会或显或隐地受其制约,呈现出时代特征。综观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的“乡村衰败”书写,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是表现乡村日常生活的全面凋敝。这种书写策略放逐对乡村现实的整体性叙述,无意演绎时代变迁中的风云裂变,亦拒绝以戏剧化的情节展示乡村传奇,而是聚焦碎片化的生活细节,原生态地描摹乡村琐碎的日常生活,以此裸呈乡村的凋敝与荒芜:乡村物质生活陷入困顿,乡村传统文化趋向衰败,乡村伦理、道德秩序轰然崩塌。这类写作的典型有贾平凹的《秦腔》,罗伟章的《声音史》,林白的《万物花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妇女闲聊录》(新星出版社,2008年)。2005年出版的《秦腔》被评论家称为一部“废乡”之作,<sup>[5]</sup>可谓是通过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显示乡村凋敝的最为突出之作。这

部小说密实地呈现了清风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生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等,<sup>[6]</sup>在淋漓尽致地表现日常生活画面、乡村细节的同时,透视出乡村生活的贫困、乡村道德伦理的失序、乡村传统文化的没落,实乃一幅工笔式的乡村沦陷全景图。《声音史》与《秦腔》的写法颇为类似,也以一个天赋异禀的叙述人(对声音极其敏感并具有出色模仿能力的杨浪)的视角观察乡村日常生活,显示乡村的空心化与凋敝之状。杨浪童年时能听到村里的17种鸟叫声,后来变成了16种、15种、14种,最后只剩下了4种。年轻一代出走城市,离人不归、房倒屋塌、田园荒芜,村里只剩下九弟、贵生等几个老光棍,54岁的杨浪成了最年轻的人。死寂的乡村,只能依靠杨浪模仿往昔的鸡鸣鸟啼、牛哞羊咩以及风声、雨声,虚拟式地得以恢复生机。千河口村的声音变迁史,就是日趋衰败的历史,令人感到扼腕的悲凉。林白的《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这两部作品有互文关系,后者是为前者写作时采访所得的素材,都展现了王榨村的日常生活,呈现出脱序、沉沦、乡村诗意消亡的景象,似乎村民的日常生活只剩下打麻将、赌博、打架、偷东西或是偷情。

第二是对乡村苦难的极端渲染。这种书写方式热衷于浓墨重彩地渲染乡村现实的苦难情形,刻意展示农民受难的命运,把苦难视为乡村现实的全部,“似乎苦难就是农民生活的全部,芸芸众生世界唯有农民是苦难的承担者”。<sup>[7]</sup>概言之,这种“乡村衰败”书写路向的核心内容,就是刻意凸显乡村苦难,通过对苦难的描述,揭示背后触目惊心的衰败。典型文本有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夏天敏的乌蒙高原小说、雪漠的西北乡村小说。陈应松的《母亲》(《上海文学》2006年第10期)中的母亲中风瘫痪在床,成为儿女们的沉重负担与累赘。最终,儿女们不得不选择残忍地毒死母亲。人性、伦理发生如此异变的原因在于:在破败的乡村生存环境中,每个人都面临艰难窘迫的处境,并诱发了身上的人性之恶。读者在为小说人物人性畸变扼腕而叹的同



时,不禁感慨乡村衰败的残酷与无奈。夏天敏的《徘徊望云湖》(《十月》2002年第3期)、《好大一对羊》(《当代》2001年第5期)等作品,都勾勒了云南乌蒙高原的破败村庄与农民的赤贫生活:村民面色如土,吃的是野菜洋芋,住的是茅草窝,穿的是破衣烂衫,生活中的一切都极为匮乏。雪漠的《大漠祭》(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猎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也都以令人震撼的笔触描写了西部甘肃乡村的破败景象与农民的悲苦生活:村庄即将被沙漠吞噬,生态环境恶化,井水枯竭,动物消失,村民家里鼠害横行。刘醒龙的《痛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张学东的《妙音鸟》(作家出版社,2008年)、葛水平的《喊山》(《人民文学》2004年第11期)亦从不同角度呈现了触目惊心的乡村苦难现实。

第三是对城市蚕食的怨愤。中国文学长期以来沿袭着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道德视域评判城市与乡村,前者往往被叙述为危险、堕落、丑恶之所,后者则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是充盈着纯朴、美好与诗意的空间。这类作品有着共同的特点:要么诗意地颂赞乡村,要么对城市充满恐惧与批判,前者如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后者如“十七年”时期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们夫妇之间》。不同的是,21世纪中国当代小说中的这类“乡村衰败”书写,虽然也是从城乡对峙的角度来切入,但是没有诗意化乡村,亦不是撕心裂肺地控诉、批判、指责城市在道德上的堕落,而是更多地关注城市以其强大的现代性优势对乡村的蚕食、侵蚀,从而导致乡村的凋零与衰败。这里既有地理意义上空间的蚕食,亦有文化意义上城市文明对乡村的强行侵蚀。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贾平凹的《土门》就关注了城市对乡村蚕食这一主题,小说讲述了仁厚村被城市吞没,村民无可奈何地进行抵抗的悲壮故事。同样,张炜的《九月寓言》也写了一个小村庄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沦陷的故事。21世纪以来,这类作品日益增多,如关仁山的《白纸门》(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其中的雪莲湾临海而生,

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被侵吞并最终瓦解。叶炜的《富矿》讲述了富含矿藏的麻庄因煤矿公司的进入而迅速城镇化,原本乡亲和睦的邻里关系、淳朴的民风民俗均荡然无存。白连春的《拯救父亲》(《人民文学》2000年第9期)、向本贵的《农民刘兰香之死》(《当代》2004年第1期)描写了城市对乡村财富的涸泽而渔式地攫取,最终引致了乡村的贫苦与衰败。刘继明的《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则叙述了全球化背景下城市资本对乡村的野蛮入侵。

第四是对村庄消逝的直接悲悼。村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一个完整的形象谱系,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颓败的缩影,或者是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乡村切片,或者是展演乡村改革的舞台……表征着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亦寄寓着作家不同的精神旨归。这里所论述的村庄的消逝,是指实体层面的村庄,因为“空心化”而衰落并走向消亡。这类作品通常直接勾勒乡村破败的图景,核心内容是书写乡村的“死亡”,对乡村的消失流露出哀婉、悲悼的情怀。从一些小说的标题即可窥见作者所要表达的题旨,如赵本夫的《即将消失的村庄》、曹乃谦的《最后的村庄》等。《即将消失的村庄》一开头便描摹了不忍直视的乡村衰败景象:“溪口村的败落是从房屋开始的。在经历了无数岁月之后,房屋一年年陈旧、破损、漏风漏雨,最后一座座倒塌。轰隆一声,冒一股尘烟,就意味着这一家从溪口村彻底消失了。每倒塌一座房屋,村长老乔就去看一下,就像每迁走一户人家,他都要去送一下,这是他的职责。”<sup>[8]</sup>在这里,房屋以倒塌、废弃的形式出现,预示着农民的决绝离开与乡村衰败的现实。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十七年”文学中,柳青《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发家立业的愿望与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三合头瓦房院”。20世纪80年代高晓声的代表作《李顺大造屋》中的建造房屋,表现的是农民充满希望的新生活的开始,李顺大毕生的志愿就是造三间屋。可如今农民纷纷弃屋而去,这与当年的“梁三老汉”“李顺大”之渴

冀拥有房屋或费尽心血造屋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农民对房屋的不同态度,分别对应着不同时代的乡村境况:希望与绝望。与此类似的,还有季栋梁的《上庄记》,小说以扶贫干部来到上庄村的所见所闻为线索,描述了乡村房倒屋塌的萧条景致:“有些院落箍窑塌了,由于长年累月烟熏火燎,在昏黄的阳光里黑乌乌的像山洞。有些院落院墙倒了几堵,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脱落了牙齿,从豁口看进去,院里长满了干枯的荒草,在风中瑟缩,发出呜咽声。有几扇铁大门,风蚀雨涩的,脱落了铆钉,铁皮在风中发出巨大的哐哐声,锤头大的铁锁锈成了褐红色,被风曳动咣当有声。”<sup>[9]</sup>上庄村触目惊心的凋零情形与即将消失的命运,于此毕然呈现。格非的《望春风》(《收获》2016年第1期)也讲述了一个村庄消亡的历史,小说聚焦于长江边上的古村儒里赵村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21世纪初的历史变迁,叙述了儒里赵村几十年来之乡村田园风景、民风民俗、世道人心等方面的嬗变。小说结尾处写道,村庄因工业化、城市化沦为一片废墟。

严格说来,将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的“乡村衰败”书写划为上述四种类型,并不能如“楚河汉界”般明晰,当然亦不能穷尽这一时期涌现的全部相关文本。如此命名这些类型,不是给它们贴上单一的标签,而只是将文本中最明显的特征与主导倾向概括、提炼出来。具体深入到文本的细部,其主题内涵可能存在上述几种类型交织的情形。

### 三、放大“乡村衰败”的文化症候

一个事实或许应该承认,乡村衰败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一定的时段与地域范围内,中国乡村出现衰败现象,自然也是客观存在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只要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就必然伴随着‘三农’问题,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百年来的‘内在’悖论。”<sup>[10]</sup>但如前文所述,从历史纵深的视野来看,1949年以来七十年的乡村演变历程,在整体上越来越好

是不容辩驳的历史事实。因此,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仅仅凸显乡村衰败的一面,有意悬置乡村向好的一面,笔者以为,这并不只是一个文学如何反映现实的问题,还涉及创作主体与乡村之间复杂的“情感”因素,文学创作观念、方法的变化,社会文化语境以及作家的当下生存处境。

首先是将乡村“问题化”的文学传统。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型国家来说,现代性往往是一个悖论般的存在,诚如有学者指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还很不充分,中国的后现代性问题也不是继现代性充分发展之后浮出水面的,而是扮演‘早产儿’角色与现代性同时并存。加上全球化浪潮日猛,西风东渐加剧,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性的黑手悄悄伸入中国现代性的衣襟,中国社会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局面。”<sup>[11]</sup>换言之,吁求现代性与反思现代性并存于现代以来的中国,或者说,在现代化之途中,后现代型的中国,既有对现代化的渴望,亦有对现代性之“他者化”的恐惧。不难发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乡村叙事中,乡村总是被现代性话语所缠绕、限定。当要表达渴望现代性,建构工业化、城市化景观时,文本就竭力渲染乡村是“国民性痼疾”所在,象征着落后与传统。远的且不论,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小说,从《陈奂生上城》到《人生》《浮躁》及至《老井》等小说,都或显或隐地循此思路。而当作者反思现代性对乡村的侵蚀、思考中国现代性设计方案中城市对乡村掠夺的冷酷时,又不免尽力凸显乡村衰败、农民苦难的图景。在90年代,谓之“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如关仁山《九月还乡》(《十月》1996年第3期)、刘醒龙《大树还小》(《上海文学》1998年第1期)、韦晓光《摘贫帽》(《上海文学》1996年第8期)等作品即如是。总之,对乡村的“问题化”叙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由来已久的叙事传统,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这类作家们必须要标新立异地把自己所看到的和发现的问题书写出来,使这些问题成为公共问题……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农民

以及他们的生活在这些作家的书写中常常成为一种可被界定的因而是被刻板化的对象。这些作家认为在乡村那里,人们的生活是散漫、混乱、缺乏凝聚力甚至是极度苦难的,并由此祈求国家以及外力的帮助来改变他们所描述的那些‘不堪’的状况。”<sup>[12]</sup> 21世纪以来,作家集约式地书写乡村的衰败,也正是这种“问题化”乡村文学传统的延续。湖北作家刘继明就坦言:“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村问题,中国文学面临的重大问题同样是怎样书写农村和农民。”<sup>[13]</sup>

其次是作家童年经验与乡村现实之间的心理落差。“童年经验一般以回忆的机制与作家现时的生活经验接通,从而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sup>[14]</sup> 就此而言,当作家书写乡村现实时,童年的乡村经验自然会与现时经验“接通”,而根据遗忘的规律,人们记住的大多是那些有价值的和有意义的东西,使得记忆中的故乡总是美好的。时过境迁之后,当作家将记忆中的乡村与当下的故乡作比较时,心理上自然会产生落差。我们知道,当下书写乡村的作家一般具有“城籍乡裔”的身份,以“50后”“60后”以及“70后”作家居多(“80后”作家较之前辈作家,对乡村的书写明显减少,暂且不论)。其中“50后”“60后”作家早年的乡村经历虽然是与饥饿、贫困联系在一起的,但不得不说,彼时的乡村生活总体上是充满理想与激情的。集体主义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底色,而当下的乡村则呈现出人与人之间“原子化”与疏离化的状态,《创业史》《山乡巨变》以及《艳阳天》所描绘的集体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已经彻底崩解。面对童年经验如此翻天的“逆转”,“50后”“60后”作家很容易流露出浓烈的失望情绪,深感记忆中那个美好的故乡早已消逝。如贾平凹所说:“原来我们那个村子,民风民俗特别醇厚,现在‘气’散了,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狀在现实中没有了。”<sup>[15]</sup> 在此情形下,当书写乡村现实时,自然而然就会感到乡村现实问题的严峻,不由地有衰败之感。

同样,“70后”作家之所以书写乡村的衰败,

也和童年体验与当下之变的心理落差有关。事实上,他们的童年时光是20世纪80年代,那正是中国乡村改革如火如荼的阶段,是最富有生机、活力澎湃的时期。等他们走上文坛,开始书写当下的乡村时,总是习惯性地与童年记忆中的乡村进行对比。相较之,当下的乡村在他们笔下自然呈现出萎靡低沉的样貌,透出一种无可阻遏的衰败命运。因此,“70后”作家书写乡村现实状况时,多是通过回忆与对比的方式,表达对当下乡村的否定与忧思,比如李师江的《福寿春》写父子两代人对乡村生活的不同态度。父亲对土地充满挚爱,留恋乡村田园生活,而儿子则仇恨与拒绝土地与乡村生活,由此揭示出乡村世道人心、伦理的堕落。正如小说中的人物安庆嫂所说:“如今人变得厉害了,一个个烂了心肝的胆子大胃口,恨不得把天咬下来吃。”<sup>[16]</sup> 界愚的《田园诗》也在今昔对比中传达着乡村田园诗意荡然无存的忧郁:“河滨大多已经干枯,绿野中到处沾满着尘土,远远看去就像一个个斑秃的脑袋,有种说不出的怪异,而风中漫卷的也不再是泥土与稻草的气息,却是那些褪色残破的薄膜包装袋”。<sup>[17]</sup> 类似的作品还有徐则臣的《还乡记》(《当代》2007年第4期)、鲁敏的《颠倒的时光》(《中国作家》2007年第2期)等。

第三是乡愁体验的惶恐心态。厨川白村曾说:“一个人疲倦于都市生活后,不由对幼少年时的田园风光或纯朴的生活,兴起怀念和向往之情,是属于一种‘思乡病’”。<sup>[18]</sup> 对于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作家来说,自然也有这样的“思乡病”或“乡愁”。乡愁体验的产生,一般和创作主体在都市生活中的处境与心理诉求有关。随着在城市生活时间日久,这些书写乡村衰败的作家对故乡的记忆已然模糊,同时对都市生活又深感疲惫,使得他们极度渴望心灵的慰藉。于是,作家对乡村传统的风物景观、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充满了眷恋,也对故乡亲人有着挥之不去的牵挂。由此,作家对故乡的一切,自然就产生了害怕变革的惶恐心理。



一旦作家发现故园情景、旧时生活、家乡亲人发生改变或消逝时,笔下就很难摆脱痛惜乡村衰败或消逝的挽歌情调。例如,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说:“故乡呀,我感激着故乡给了我生命,把我送到了城里,每一次想故乡那腐败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我就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以前写过,那都是写整个商州,真正为棣花街写的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sup>[19]</sup>格非也同样如此,他谈到创作《望春风》的缘起时说:“这部作品我想了很多年。过去村子里有河流、有庄稼,每次回到村庄,感觉村子是永远不会变的,它的存在不断印证着家的感觉。村庄拆掉后变成荒原,和丘陵地带连在一起,没有任何标属……我决心要写一部小说,就从五六十年代写起。如果不写,用不了多少年,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也许不会知道,长江腹地曾经有过这些村子,有过这些人,这些人和这片土地曾有过这样一种关系。”<sup>[20]</sup>正是出于对乡村变化的焦虑、惶恐,于是作家尽力呈现、放大乡村废墟化的忧心图景。

最后是媒介议程设置与集体性的城市焦虑。现代传播学理论上“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一说,即大众媒介是公众认知社会的重要信息源与影响源,如果它集中或反复突出某些信息和议题,就会提高公众对这些信息或议题的重视程度,相关报道也会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简言之,公众会更重视那些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21世纪以来,不少作家的写作选择和媒介议题,如余华的《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贾平凹的《极花》、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等。这些作品包含着诸多媒介热点话题,充斥着现时性、纪实性的媒介信息,故能引起读者的高度关注。同时,不少作家热衷于痛心疾首地描绘乡村的衰

败,亦有媒介议题设置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当下集体性城市焦虑的呼应。虽然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但由此而来的负面效应,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高额房价、食品安全问题、工作焦虑、水泥森林的压抑等方面,已经令很多都市人焦虑不已。这已然是媒介上习见的议题,也是社会公众的集体性焦虑,关注程度之高自不待言。

如何纾解这种集体性的城市焦虑?在这一点上,乡村恰好能够发挥城市不能提供的作用。“较之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梦幻。”<sup>[21]</sup>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乡村需要城市,而是城市需要乡村。于是,走向乡村,在乡村的怀抱中获得身心调适,成为许多现代都市人的“不二选择”,近些年来,兴起的乡村旅游热以及不少城市精英重返乡村的现象,便是典型的例证。正因为乡村对纾解城市焦虑的重要性,故“乡村衰败”话题一定会触动有着集体性焦虑症的都市精英的敏感神经,关注程度自然很高。当作家在创作中凸显媒介热点的“乡村衰败”话题,其作品关注程度亦随之水涨船高。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以及创作心态的复杂性,很难明晰界定哪一位作家或哪一部作品对应于哪一种具体原因。上述各要素总是以纠缠、模糊、混融的状况,促动着作家对乡村衰败的书写。

#### 四、“乡村衰败”悲情的限度

总体说来,当下中国的乡村现实,是复杂而充满张力的——其中不仅有破败、坍塌和逃离,亦有生长、建构与转型。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小说纯然以“乡村衰败”作为中国乡村表述的向度,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局限:

第一是对中国乡村整体现实的盲视。在卢

卡契看来,“如果文艺确实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它就特别需要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来把握现实,而不局限于反映直接经历的现象。假若一个作家致力于如实地把握和描写真实的现实,就是说,假若他确实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那么现实的客观整体性问题就起决定性的作用。”<sup>[22]</sup>卢卡契强调要呈现“真实的现实”,必须把握“现实的客观整体性问题”。就21世纪中国当代小说的乡村书写而言,如果还是依循惯有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的传统写作模式,单纯地描写“乡村衰败”的阵痛与弊端,那么小说中的当下中国乡村就缺乏完整的真实,只是局部问题的放大或者简单、粗暴的类型化处理。恰如石一宁所说:“在一些作家笔下,中国当下农村尽是田园荒芜,老弱病残,一片凄凉,作品的基调是悲愁、哀叹、绝望乃至愤怒。不能说其中没有作者耳闻目睹的真实,也不能说作者没有写出细节的真实,但也仅此而已。”<sup>[23]</sup>正是当代作家单向度地聚焦于“乡村衰败”,热衷于将乡村呈现为一个“悲惨世界”,遮蔽了当下中国乡村现实的多重性与复杂性,亦阻滞了对中国当下乡村变迁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深度思考,导致乡村叙事堕入了古已有之的“悯农”与“哀乡”的浅表化的窠臼。

第二是人文情怀的缺失。诸多作家叙述乡村的衰败、哀叹村落的消亡,其实是以进城经年的都市人的视角,把乡村当成了供自己怀旧与凭吊的空间,没有设身处地从农民的角度思考“乡村衰败”的原因。一方面,传统农业文明被现代化工业文明所取代,此乃人类社会历史嬗替的必然规律。中国正在推进的现代化工程,必然造成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渴望乡村永远是静谧、和谐、诗意的桃花源式存在,希望农民永远固守土地,维持前现代的生活方式,是不现实的。简言之,伴随城市化进程,乡村的变化是必然的。另一方面,毋庸讳言,当下中国的城乡差距依然悬殊,很多农民向往城市文明,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实乃人性使然。因此,“乡村衰败”的出现,在某种程

度上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市场经济规律的自然选择。当生活在都市里的作家痛惜乡村的空心化、田园荒芜时,甚至可以说是缺乏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农民的具体表现:忽略农民的主体性要求,排拒农民的人性需求。这亦暴露了已经中产阶级化的都市作家与农民之间的深刻隔膜。

第三是价值取向的滞后。小说的“乡村衰败”叙事,对“城乡关系”认识还是持守二元对峙的思维模式与价值立场。认为乡村之衰败,莫不缘于城市对乡村资源的索取,或者城市的虹吸效应。简言之,在他们笔下,城乡关系似乎只能是“水火不容”。事实上,在现实层面,新世纪以来,国家在政策上大力导引着工业反哺农业,城乡一体统筹发展,亦使得新世纪的城乡关系进入反哺共存的阶段。如果“乡村衰败”书写,对城乡关系的想象方法,依然是二元对立的书写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然失效,其价值取向就会显得有些滞后或错位。

第四是艺术上的同质化。因为趋向于共同的“乡村衰败”叙述,体现在小说创作上的缺憾,便是在艺术上同质化严重,造成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很少有作家直面现实、寻求独特的表达方法。不少作家沿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尤其注重呈现生活的细节,形成了惯性写作的现象。如贾平凹的小说从《高老庄》到《秦腔》《带灯》皆是沿此惯性轨道滑行。二是叙述框架大同小异,无不外乎离开故里多年的城籍乡裔人士回家之“游子返乡”,农民迫于乡村破败不堪、无以为计而进城打工的“乡下人进城”以及国家权力的代表者(如上级机关派来的扶贫干部、第一书记)来到村庄之“外来者进村”的三种老套模式。三是表达“乡村衰败”的元素、意象亦有惊人的相似。如李锐的《残摩》(《收获》2004年第5期)、胡学文的《命案高悬》(《当代》2006年第4期)、杜光辉的《浪滩的男人和女人》(《时代文学》2007年第5期)等不同文本之间均有着“互文性”,基本上在此范围内腾挪:要么是乡村物质匮乏的苦难深重;要么是乡村权力肆虐无度;要



么是留守老人的寂寞凄凉;要么是乡村环境污染,诗意沦陷;要么是村庄房屋颓圮。对此,刘琼有过严肃的批评:“老实说,现有的大量的乡土书写与中国乡村现状并不匹配,一是不能真实地再现乡村现实的复杂性,二是叙事陈旧,堕入模式化和浅表化。”<sup>[24]</sup>此论甚是。

## 五、结 语

萨特曾说:“如果文学不要求一切,它就毫无价值可言。这就是我所说的‘介入’。如果文学变成纯粹的形式或者颂歌,它就会枯萎凋谢。如果一个写下的句子不能在人和社会的某一程度上产生反响,那么它是毫无意义的。所谓某一时代的文学,只能是用文学体现的这一时代,难道不是这样吗?”<sup>[25]</sup>客观地说,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大量出现的“乡村衰败”书写,正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作家介入现实的努力。但文学究竟如何介入现实,小说中的当代中国乡村现实究竟该是何种状貌,这涉及文学处理现实经验的问题。萨特指出:“文学介入,这归根结底就是承担全世界、承担整体。”<sup>[26]</sup>如果过分拘泥于“乡村衰败”现象的堆砌,缺乏对历史纵深与现实景深的整饬,这种仅仅停留在浅表现象描摹的“乡村现实”,只能沦为作家迎合媒介趣味,或兜售个人私趣的道具。因此,要真实地在小说中再现 21 世纪的中国乡村,作家须在时代变革与历史转型的背景下,深刻认识到中国乡村的复杂性,努力写出中国乡村整体性的现实。

### 注释:

[1] 那成举:《乡村社会的螺旋线——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1期。

[2] 参见彭大鹏、吴毅:《单向度的农村——对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一项探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3] 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序言”,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9页。

[4] 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95页。

[5] 参见《秦腔:一曲挽歌,一段情深——上海〈秦腔〉研讨会发言摘要》,《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6][19] 贾平凹:《秦腔》“后记”,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480、478页。

[7] 雷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三大病症》,《文艺评论》2010年第6期。

[8] 赵本夫:《即将消失的村庄》,《时代文学》2003年第4期。

[9] 季栋梁:《上庄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页。

[10] 何慧丽:《“百年乡恋”的历史背景与人生抉择》,《中国合作经济》2008年第10期。

[11] 王建民:《现代性在中国:建构与反思》,《光明日报》2006年9月25日。

[12] 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3] 刘继明:《农村题材和农村问题》,《名作欣赏》2009年第13期。

[14] 重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15] 贾平凹、郗元宝:《〈秦腔〉痛苦创作和乡土文学的未来》,《文汇报》2005年4月28日。

[16] 李师江:《福寿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267页。

[17] 界愚:《远逝的田园》,《中篇小说选刊》2009年第3期。

[18][日] 厨川白村:《西洋近代文艺思潮》,陈晓南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20] 舒晋瑜:《格非:〈望春风〉的写作,是对乡村作一次告别》,《中华读书报》2016年6月29日。

[21][法] H.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页。

[22][匈] 卢卡契:《现实主义辨》,载《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卢永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页。

[23] 石一宁:《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个层面》,《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5期。

[24] 刘琼:《关于近五年长篇小说的一点看法》,《文艺报》2017年8月28日。

[25][法] 让-保罗·萨特:《美在于对总体的追求》,载《萨特思想小品》,黄忠晶、黄巍编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26][法] 让-保罗·萨特:《关于〈家庭的白痴〉》,《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强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38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